晚清教育宗旨奏折试析

朱　鹏

In 1906 Rong Qing and other offcials presented a memorial to the throne entitled "The Board of Eductation Requests the Emperor to Establish Educational Standards." After its acceptance this memorial was enforce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nd became the guiding principle for education. It was the first official Chinese document on education published in modern times. As One of the policies that the Qing government undertook to consolidate the government, this memorial advocated the inherent moral principles of China as a means to strengthen the foundations of the dynasty but, because the authors were influencde by Japanese educational theories and practice, the memorial also emphasized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ism among students and instilling them with concern for public welfare and pragmatism.

光绪三二年(1906)旧历三月初一日由协办大学士、学部尚书荣庆等人上奏的《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以下简称《奏折》),是日得上谕,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端教育宗旨颁布全国,成为继《奏定学堂章程》之后进一步明确、亦为我国近代以来首次专文公示的教育指导方针[①]。

二十世纪初期,在变法、立宪、守旧以及面对革命等势力的错综交织之中,成立学部、制定教育宗旨可说是深承慈禧"圣意",为挽救清廷命运而实施各种措施中的一环。面对立宪改革,作为慈禧的嫡系,荣庆又是一位老谋深算、以通过学堂教育抵制和消除革命的守旧派。《奏折》主张中国固有"彝伦"的重要,倡导"崇敬国主"为政治之本,以得到"整饬纪纲"的结果[②]。这些都客观地决定了学部上奏的这篇奏折的基本性质。但是,《奏折》的实际拟撰者是当时就任学部侍郎不久的严修[③]。严修曾为贵州学政、翰林院编修。而后以奏设经济特科折得罪座师徐桐,无奈挂官归乡天津、又以兴学实绩而被荐举入学部,成为学部中重要的汉人实务官僚。严修早年博闻广学,从师于张幼樵(佩纶)。除儒家经典外,多习天文、算学。后年办学堂、兴教育,致使风气盛直隶,为全国所瞩目[④]。并东访日本,考察教育、实务,是一名积极接受新知、新学,倡导教育救国的知识分子。

本文拟结合严修的东游考察和明治二十年代前后日本教育的实况,试析《奏折》内容的构成特色,以为探讨晚清士绅官僚对近代教育的认识过程提供些许参考。

一、严修的日本考察

十九世纪末期,随着中国部分官僚、知识分子赴日,有关日本的信息急遽增加,特别是慈

禧太后一九０一年一月下诏变法之后，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共同上奏的“会奏变法自强三疏”倍受重视。其第一疏中除文武学堂的设置、科举制度改革之外，奖励海外留学、特别是日本留学，在士绅子弟中间引起了很大影响。同时，晚清以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林乐之(Young J. Allen)等基督教传教士的活动，以及梁启超参与的《时务报》、罗振玉等的《教育世界》等等近代杂志的兴起和广泛流行，将日本教育的信息广传于知识、教育界[⑤]。加之日本军政关系以及各类教习的来华，在思想、制度、课程、内容等方方面面予晚清教育改革的影响等，都为一九０二年后大批士绅、留学生访日提供了条件。严修深感从来之教育脱离实用的弊端，并积极主张教育改革、倡导知识结构的变革。自一八九八年奏设经济特科折之后，在天津奋力于家学、私塾之建设，聘张伯苓等人教习英文及西学知识，并开始了兴办学堂的实践活动。在赴日留学高潮兴起之初，严修即将自己的子女及身边的年青学子送于日本，培养师范和专门人材。

在一九０六年前，严修本人东访日本共有两次。一次是一九０二年携子赴日以求其长子严智崇、次子严智怡的留学着落，属私访；另一次则为一九０四年因兴学成绩斐然，受袁世凯之嘱就任直隶教育司督办，旋即赴日的教育考察，属公务。虽然在形式上二次东访有所不同，但就严修在津兴学、急需开拓视野、扩大与日本交往的本意来说，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下面仅就两次访日的大致行程略作介绍[⑥]。

继一九０一年严修二子随日人大野赴日寻求留学落脚处之后，翌年严修亲自携子东渡日本。其全程自同年八月乘日邮船公司立神丸离塘沽，至十月由长崎踏归途止，于大阪、神户、京都等地逗留三十日，而后于东京滞留四十一日，合计在日期间近七十日左右。其日程内容大致可分为下述三个方面：一为交游往来。除了与曾逗居天津的日友交往之外，还拜访了包括大隈重信、伊泽修二、藤泽南岳父子及内藤湖南等日本政、官界人士、汉学家。并与在日领事官员和留学生进行了交往，适时正值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访日，所以在东京期间，与吴汝纶相伴参观游览。其二为参观访问，此类内容充用了严在日之大部时间。参观单位亦分两类：一类为行政官府、各种企业、博物馆等，另为学校、福利设施等。除上述内容之外，严修为津欲办之民立第一小学堂购置了部分教材、教具。

严修于同年十一月回津之后，继续着手扩大和增设学堂，开展新式教育研究。在一八九八年严氏家馆的基础上，一九０二年与商绅合办正式成立了民立第一小学堂，在宅内增设了严氏女塾。翌年所参与或发生关联的公立学堂、教育设施有：北洋工艺学堂、城隍庙两等官小学堂、河北大寺两等官小学堂、行宫庙两等官小学堂以及民立第二小学堂、教育补习所、教育研究所、半日学堂等等[⑦]。严修之兴学活动深得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的赏识，特奏朝廷赐予五品卿衔恩赏。一九０四年四月严修接任直隶学校司督办职后，五月即再次赴日本考察教育。严修的第二次赴日考察行程为：一九Ｏ四年五月出发，同年八月归津，在日期间合计近两个半月。由于是专程的教育考察，故专以文部省及各学校的考察为主。考察内容及日程大致可分为：①文部省听讲教育行政、教育课程、教科书编纂等；②高等师范学校及附属小学、高等工业学校、职业小学等教育机关的实地考察和研究；③弘(宏)文学院、弘文外塾等直隶留学生学习、生活的探望及参加毕业典礼仪式，接学生回国；④与伊泽修二、渡边龙圣等人就直隶教育的探讨以及日人教习聘任等事的商讨等等。两次考察之中，严修接触了日本社会实际，考察了学校施设，交往了日中各界人士，为办学、兴教撷取了大量的参考资料，客观上为制定《奏折》、主持学部工作提供了感性认识。

关于《奏折》的制定过程，笔者掌握的情况并不多，但从学部成立到教育宗旨出台，仅不过数月。在五大臣出洋、预备立宪的进程中，《奏折》的提出是匆忙的。然而，对立宪并非有真意的慈禧，调荣庆为学部尚书，自然决定了要《奏折》适应朝廷“敦崇正学，造就通才，用副朝廷建学化民成俗之至意”的性质。在此前提下，经严修之手拟撰的《奏折》吸取了日本教育的哪些经验，值得进一步探讨。

二、关于“忠君”、保国体的论述

不言而喻，《奏折》的中心思想是“忠君”，这是贯穿全文的基本线索。文中首先明确了这样一个观点：“近世目论之士，袭泰西政教之皮毛者，甚欲举吾国固有之彝伦而弃之，此非以图强，适以召乱耳。东西各国，政体虽有不同，然未有不崇敬国主，以为政治之本者。”意思是说，近来学习西洋者，嘴称图强，但视固有中国之道统、人伦而屏弃不要，只求西人之表面现象，这样下去只能引起混乱，必须以国君、道统为治国安邦的根本。

可以看出这是对戊戌变法后社会思潮的一种引导和明确，表明了朝廷保国体、举传统人伦的基本思想。二十世纪初叶，清朝统治日薄西山，风雨飘摇。康梁变法虽遭朝廷摧毁，但为挽大清欲灭之势，西太后等保守势力亦不得不举起兴学、普及学堂、废除科举的旗帜。同时，地方士绅、知识分子亦掀起救国、图强的浪潮。“外侮日逼，神州陆沉，空谈改革，不足以救国，入手第一著，其教育哉，顾居今谈教育有二要，曰普通主义，曰普及主义，予以士农工商人人必须之学艺知识……”⑧，诸如此类之兴学议论，在当时可认为是一不可抵挡的势力。尽管在保清、立宪、革命的认识上朝野、各种势力之间有着各自不同的立场，但普及教育，使教育为士农工商全民接受之，在这一点上却是并非相悖的。

然而，兴教育、改体制当然不能没有精神上的支柱，不能没有所谓的根“本”。在这个问题上，薛福成、王韬、郑观应等人“君民共主”的启蒙思想，孙家鼐、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一直对朝廷、对科举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官僚、士绅有着很大的影响。无可否认，“忠君”“尊孔”是他们起步、立身的基点，在预备立宪的进程中，作为学部的重要政治意图之一是通过这种思想来消除知识分子在西洋文化冲击下的混乱，通过学校教育来试图稳固清朝的千秋大业。因此，图强、改革、学习西洋之政体、学问，不能盲目沿袭，只视皮毛。立国保统要有自己的主见，即图变革并非不要国体，搞维新并非不要从来之法度、伦理，否则弃本而势必召致思想混乱、致使国中上下不安。

这些思想虽然不是学部、或者严修的发明，但一九0六年学部的主要精神，就是要拨清时世认识、使“忠君”的思想得以坚定不移地植根于教育中。而严修拟定的这一奏折中把通过教育的“忠君”口号提得更明确，对“忠君”的方法较之张之洞的“知本”、“正权”说提的更具体。⑨《奏折》在引据日本的示例时指出：“日本之教育，所切实表章者，万世一系之皇统而已。”介绍通过教育来维持皇统之方法为“凡其国家安危所系之事，皆融会其意于小学读本中，先入为主，少承若性。故人人有急公义、洗国耻之志，视君心之休戚为全国之荣辱，视全国之荣辱即己身之祸福，所谓君民一体者也。”“忠君”问题是清朝社会的大前提，本无需从外国的教育中去寻找答案，但在危机四伏、人们张目迷信外国的时候，在这里反借用日本近代君主体制自然不能不说是有作者之用心的。

就严修本人的政治态度说来，当然他不是反清的革命派，可以肯定地说严修对皇朝统治是十分关心的。一九〇八年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过世，严修哭拜于乾清宫门外，发"睹目前之惨状，思后此之危局，真不知命在何时"肺腑之言[10]，可认为是一证明。但同时严修亦不是旧知识、旧体制的绝对保守派，设经济特科的奏折，可说是废除科举、兴学堂的先声。对于康梁的变法，他虽并非是维新活动的直接关系者，然而在思想上却产生着极强的共鸣。严修关心清廷时局，但同时在日本又亲身体验过通过学校教育启发民众的作用。在承"宜取开国以来，列祖、列宗缔造之艰难，创垂之宏远"以及"务使全国学生，每饭不忘忠义，仰先烈而思天地高厚之恩，睹时局而深风雨漂摇之惧"的前提下，文中更十分关注"彼山野椎鲁之民，其于国家之休戚，或瞢然而不知，或漠然而不以为意"的问题，对这种问题出现的原因，又认为"非民之无良也，无以喻之则不晓，无以激之则不动，无以训迪之则知识不进，而忠义之气虽发而不能中节，是则司教育者之责也。"

严修在赴日考察的日记中，虽然对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以及明治《大日本帝国宪法》、〈教育敕语＞下的忠君爱国教育未见有过多的记录。但参观贵族院，目睹君主摄政之形式，参加日本体育会，会前"奉读敕语，一同起立，最敬礼"，于学生同唱＜君之代＞之体验，想必这些对于严修拟撰《奏折》内容，都有一定的影响[11]。对于日本的政情民俗，严修是持称赞态度的。后日予友人的信中如此写道："弟碌碌送日，无以善可陈，去年虽有海外之游，过眼匆匆，毫无所得，唯亲见彼邦政教之美，民风士习之良，余思吾国人不得一一亲见，为可憾也"[12]。

《奏折》尽管以尽忠、保皇统为总调，得值得注意的是，问题的提出紧扣唯恐"召乱"之结果，特别是十分明确地意识了由于保持天皇体制、致使形成君民一体先进国日本的先例。如前所述，严修是一名热心兴办学堂、并企望以此来唤醒民众、启发百姓的。由此观点出发，笔者认为严修在深考了日本示例后的忠君之说，在忠君的大前提之下，更加关注以忠君为本，普及教育，唤起民识，使国民无论是都会之地、冠带之伦，还是山野之民都能晓以治国，与国家同甘共苦。实际上是打算通过教育来创造一种国民共同的国家意识。可以说它是对张之洞《劝学篇》中单纯"以朝廷威灵合九洲之力，乃天经地义之道，古今中外不易之理"论述的进一步补充。

三、关于"尊孔"的论述

对于清末时期的官绅知识分子来说，眼前面临着两种文化：一种是以标榜修身、治国、平天下，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另一种是所谓欧美、特别是通过日本传进中国的西洋实用文化。传统的科举文化功章句，尚虚理，方法上又多有诵其词而忘其意之嫌。制度上的科举取士，使天下学子追求功名，忘其所以。当国门大开，西学流入之际，学子们又感到一种茫然若失，不知所措。以至舍本求洋，"视仁义为迂谈"，"视道德为腐论"[13]。

在这所谓的新社会未立、旧社会已败，世道人心无以为靠的过渡期背景下，《奏折》中提出："自泰西学说流播中国，学者往往误认谓西人主进化而不主保守，至事事欲舍其旧而新是图；不知所谓进化者，乃扩其所未知未能，而补其所未完未备。不主保守者，乃制度文为之代有变更，而非大经大法之概事放弃。"中学、孔孟之道在这里得到了大大强调。类似的论调在日本从进入明治十年代之后亦是存在的。明治十二年(1879)由以天皇名义公布的＜教学大旨＞中指出："教学之要，在于明仁义忠孝、究知识才艺，以尽人道。我祖训国典之大旨，在于上下一般之

教"[14]。文字表达的角度虽然不同,但这里明确指出仁义忠孝之德行教化为第一位,而知识才智则处于次要位置。在背景上,同样亦是对自《学制》以来的所谓西洋化之文明开化的教育政策给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混乱而展开的批判。尽管在其后围绕着国体、政教的确立、西洋化的启蒙问题展开过一系列的争论,但明治二十三年(1890)《教育敕语》的公布,君德"深厚"、臣民"忠孝"而构成的君民一体关系,形成了日本天皇制度下教育思想的基本性格[15]。

《奏折》的内容同时亦是对《劝学篇》的进一步补充,所谓的"尊孔"论也正是在"忠君"的前提下提出的具体教本。张之洞曾说过:"外国各学堂,每日必诵耶稣经,示宗教也。小学堂先习拉丁文,示存古也。先示本国地图,再览全球图,示有序也。学堂之书,多陈述本国先君之德政,其公私乐章,多赞扬本国之强盛,示爱国也。"《奏折》如下指出:"各国教育,必于本国言语、文字、历史、风俗、宗教而尊重之、保全之,故其学堂皆有礼敬国教之室。"日本之尊王倒幕,论者以为汉学之功"."近年以来,其国民之知识技能已足并驾欧美,然犹必取吾国圣贤之名言至论,日进学生而训导之,以之砥砺志节,激发忠义。"这些内容可认为是严修确认了日本教育后所发自内心的感想。一九0二年严修初访日本,与大阪汉学家藤泽南岳之子藤泽元造的交谈中,藤泽这样指出:"支那之讲新学多趋形迹,宜以正人心为主。正人心宜从师弟授受入手。""人知日本维新之益,而不知实基于德川氏百年间崇儒之功也";一九O四年再访日本时,与《敕语衍义》的撰写者井上哲次郎交谈,井上论"日本教育得力在德川最后之百年,既重儒学、又发明武士道,不遗余力。近三十年,后采西洋之所长故,益觉完全"[16]。这种博采东洋人伦、西洋之用的作法,无疑对严修的影响是很大的。

在具体作法上,文中指出:"无论大小学堂,宜以经学为必修之课目,作赞扬孔子之歌,以化末俗浇漓之习;春秋释菜及孔子诞日,必在学堂致祭作乐以表欢欣鼓舞之忱";"经注经说之足资羽翼者,必条分缕析,编为教科,颁之学堂以为圭臬";"高等以上之学堂,自可力造精微;中学堂以下则取其浅近平实,切于日用,而尤以身体力行,不尚空谈为要旨"。

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方法上,上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对于以儒家教育、以及近世程朱、训诂、考证等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士大夫、知识分子来说,自然是极易取得共鸣的。当然,针对外来之实用的文化,他们的内心深处又表现出一种极强的无力和惆怅感,应该说是极其复杂、矛盾的。特别是在改书院为学堂,废科举兴新教育的过程中,这种矛盾自然表现得十分明显。考察日本,获得日本天皇体制下学校教育中表现出来的复古信息,无疑对严修来说,是对自己从来之君臣一体认识的进一步印证。一八九六年严修在给友人陶仲敏的信稿中曾这样写道:"洋货虽极流通,布帛菽粟之利不能废也。西学虽极明备,孔孟程朱之道不能畔也。义理之学愈深,西学之用愈实,孔孟之道愈明,泰西之法愈见其可行"[17]。这一段话虽是为学之论,但由此亦可了解严修从来对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关系的认识。晚年之后,严修办崇化学会,宣扬儒教人伦道德思想,恐与此经纬不无关系。

总而言之,《奏折》中所指出的舍旧图新,并非放弃大经大法,以孔教为国学、国教,其目的并非单纯为复古,并非单纯为保皇和维护清朝之统治。其中既有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国体观念的固执,更为内困外患之时,在日本的刺激之下引发的、具有国家主义色彩的救国之策(虽然这种国家主义包含着十分复杂的内容)。正象〈尊孔〉条目后进而加进之文字所强调的那样,"虽然,忠君、尊孔二义,固尽人皆当知而行之矣。惟中国当列强雄视之时,必造就何等之国民,方是为图存之具,此不可不审者也"。

四、关于“尚公”的论述

不可否认，仅就社会文化角度而言，在我国广阔的疆域之中，自然地理的多样性以及历史遗留的种种原因，如何加强人心的凝聚力，创造一种相互联属的共同意识，特别是近代以来尤为受到当政者以及知识分子的关注。但另一方面，文化上之英雄、豪杰的英雄史观，却又一直左右着中国的民众社会。《奏折》之中，在这一点上亦显示出十分明确的意图。“列强竞起，人第见其船坚炮利，财富兵雄，以为悉由英雄豪杰主持之，故国以强盛。而不知英雄豪杰，间世一出，不可常恃也，所恃以立国者，乃全国之民之心力如潮、如海、如雷霆而不可遏，相亲、相恤、相扶助而不可解耳。”列强之船坚炮利，财富兵雄，并非英雄豪杰主持，乃是民众合力之故，民心之统一、之团结，在于教育，在于学堂之中。诱迪生徒尚信义、重亲睦，特别是通过修身、伦理、历史、地理等科目，启发生徒之友爱感情，养其协同一致之性质，使爱国合义之理，早早根基于蒙养教育之初。

《奏折》中又指出：“惟我国学风日变，古意浸失，修身、齐家之事，尚多阙焉不讲。至于聚民而成国，聚人而成众，所以尽忠义亲爱之实者，则更不暇过问。群情隔阂，各为其私。通国之中，不但此省人与彼省人意存畛域，即一州一县，乃至一乡一里、一家一族之中，亦各分畛域。”所以，要“欲举支离涣散者而凝结之，尽自私自利者而涤除之”。

梁启超早在《新民丛报》的〈论教育当定宗旨〉之论文中就国家设立国民教育中指出：“一国之有公教育也，所以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之结为团体，以自立竞存于优胜劣败之场也……。故有志于教育之业者，先不可不认清‘教育’二字之界说，知其为制造国民之具，次不可不具经世之慧眼，抱如伤之热肠，洞察五洲各国之趋势，熟考我国民族之特性，然后全力鼓铸之。由前之说，则教育宗旨可由立也”[18]。

无论是作为学部的总方针，或是梁启超的教育宗旨论，以“化民成俗”，在把教有作为统合国民的有利武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同时，日本明治二十年代以后教育政策的变化，也为清朝政府提供了经验。众所周知，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总国策是“殖产兴业”、“富国强兵”，致使产业技术上能与欧美近代国家相庭抗礼；而在文化教育上，明治十年代倡导儒教主义的德育强化政策，被认为虽在训导国民勿失国本、维持风教上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要讲“爱国之义”更当从西洋诸国中去找[19]。既是说中国的古书上之儒教有“忠君”、定国体之效，然乏进取之功，能造就忠君之臣民，但无宜于培养具有爱国之义的立宪国民。因此，在若想“国强”则首先要使民众兴业、殖产，只有民富了国才能强的前提下，制定国民道德体系，使民与国能互为一体，亦是明治日本国体教育的又一重大方面。《教育敕语》在阐明“君德深厚”、“臣民忠孝”的基础上，更详尽地列举了“孝父母”、“友兄弟”、“夫妻相和睦”的家族伦理，“朋友信”、“恭俭”、“博爱”、“修学”、“习业”、“启发智能”、“成就德器”的个人伦理以及“广公益”、“开世务”、“重国宪”、“尊国法”的社会伦理等。这种儒教、“启蒙”相结合的天皇制国体论，与中国旧有的“三纲五常”、君臣父子等的道德伦理相比较，又强调了友爱、公益、习业、遵法的观念。《奏折》中“窃谓中国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发明以距异说者有二：曰忠君，曰尊孔。中国民质之所最缺，而亟宜箴砭以图振起者有三：日尚曰，曰尚公，曰尚实”之言文的构成以及字里行间所表现出来的对于启发民众的迫切情绪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一九〇二年严修初访日本乘于立神丸旅途中，与船中事务长福士德太郎笔谈，其中有这样一段记录："福士问本(清)国教育之方针，予言各省方遣人赴日本考察，近顷吴京卿亦奉朝旨东游，待其归国当有建白。福士言：采他人之长固善矣，然必各有其立国之本，故不得尽与人同。又言泰西极盛难继，今虽虎视东亚，要末可以长持。吾两国唇齿相救，宜采泰西文明之利器，开我富源，以与之竟云云。"对福士的言论，严修从中感到了日本普及教育的"启蒙"作用和结果，评价是：福士虽然职位低微，但留心国家时事，言之成理[20]。可见日本教育成果之一斑。

在所谓通过学校教育来培养学生树立"公"(国家)的概念问题上，严修在日本考察过程中是深发过感慨的。一九〇二年九月十四日在东京参观之余乘马车赴浅草寺、游水族馆、登十二重楼，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十二重楼其下重列西洋镜甚多，其中写真之景多半台澎一带山水之胜与官署之形，否则与吾国战争之场也。皆彼国人得意之举。熊慕蘧曾言彼国之教童子也，必告之以日清之战，日何以胜，清之何以挫。故人人脑筋皆刻入此事，自幼以然。余游览才数处，琴平寺有北清战争图，而浅草园又有之，十二重楼则有诸照像镜矣。大凡繁盛之区，无不以此为点缀。伤哉，吾国之人其何以为心乎"[21]。一九〇四年赴日，偕张伯苓等人、率子再游上野，观日俄鸭露江之战油画均可说明严修对教育予培养学生国家观念上所发生的兴趣。

五、关于"尚武"、"尚实"的论述

在《奏折》之中，如果说"尊君"、"忠孔"为定国之本，"尚公"为统国民之总精神、总内容，那"尚武"、"尚实"则是改科举教育、兴新学、立新教的又一具体内容。

与尚公之说相近似，尚武之观念亦是中国饱受屈辱，深感文弱之风的弊端而提出的。就其内容上亦以列举外国之尚武之经验，这样写道："各国谓兵为民之血税，而天子乃与庶人同之，真可谓上下同心矣。观其师团以练兵，海陆军学校以练将，无论在校在营在操场，时时如临大敌，号令一出，虽崎岖险阻、冰雪严寒，不敢息也；虽饥冻漂溺、颠坠以死、不敢避也。然而老幼男女，遍国之人，无不以充兵为乐，战死为荣；每征兵令下，得中选者，骨肉亲戚乡里，欢舞送迎，悬彩志庆，则又何也。岂皆逼于生事而乐于战斗耶，抑摄于国法而不敢违耶。"文中之示例，未指国名，但就其征兵中选，骨肉亲戚乡里欢舞之情景描写来看，则颇相似于日本[22]。中日甲午战争给中国人留下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随之，国人之中"饷糈之心厚，而忠义之气薄，性命之虑重，而国家之念轻也"。为此，只有教育，即在学校教育中寓军国民主义于其中，才能解决其弊，才能造就出精兵强将。

在具体的课程设计上，《奏折》指出："凡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俾儿童熟见而习闻之。国文、历史、地理等科，宜详述海陆战争之事迹，绘画、炮台、兵舰、旗帜之图形，叙列戍穷边，使绝域之勋业。于音乐一科，则恭辑国朝之武功战事，演为诗歌，其后先死绥诸臣，尤宜鼓吹抑扬，以励其百折不回，视死如归之志。体育一科，幼稚者以游戏体操，发育其身体。稍长者以兵武体操，严整其纪律。而尤时时勖以守秩序、养威重，以造成完全之人格。"

教学之志，文武两道。然在晚清的传统教育之中，重文轻武，特别是在科场考试，亦重文科举而轻武科举。在学子们的行为规范上更重静而轻动。严修十分赞赏日本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曾列举日本考察之学校情形，这样奏道："臣等尝询查日本小学校矣，休息之时，任意嬉戏，所以养其活泼之性也；口号一呼，行列立定，出入教室，肃若军容，所以养其守法之性也。又尝询

查日本师范学校矣，师范为规制最肃、约束最严之地，而掷球、角力习为常课，运动竞走，特设大会，其国家且宣法令以鼓励之，其命意可知矣。”

近代日本教育强化体育教育、导入军事操练等等的作法是旨在通过教室内外的一切活动，训练和熏陶学生的爱国精神，培养学生作“帝国所需要的善良臣民”、尽“帝国臣民之义务”，建立军队式的学校，教育内容的军事化，这些可谓对其后教育的影响是极大的。严修等晚清宦僚们收入眼中的体育教育，正是这种教育传统的具体表现。

《奏折》的最后一个论题是“尚实”。晚清教育改革过程中，除“尚公”、“尚武”之外，又一为其后的中国近代化教育所吸收、特别是区别于科举旧教育的重大教育思想成果之一是知识讲求实用，崇尚实学。对于一般知识分子而言，清末重商思想的影响是很强的。他们认为：救国之路在于兴实业，振兴实业又以工艺为基本，工艺之基础在于兴学堂、兴实用教育、变革知识结构。

这一点，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已经开始受到了部分知识分子的关注。龚自珍、林则徐、魏源自不待言，洋务运动、康梁变法等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这个问题。清朝廷内，严修的“请开设经济特科折”的上奏等亦预示出这是一种大势所趋。上海、天津等地部分民族工商业的相对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对实用的知识提出了要求。在地方的学堂设立上，叶澄衷、上海近郊川沙县杨斯盛毁家兴学的态度、黄炎培实用主义教育、职业教育的产生均证明了这一点。而从来之科举制度下的教育内容，“至若高谈性命，崇尚虚无，实于国计民生曾无毫末裨益。”而“自英人倍根首倡实验学派，凡论断一事一物，必有实据以为征信。此风既兴，欧洲政治教育理学诸大家，遂争以穷幽索隐之思，发平易切近之理。”为此，普通教育之学校，“凡中小学堂，所用之教科书，宜取浅近之理，与切实可行之事，以训谕生徒。修身、国文、算术等科，皆举其易知易从者，勖之以实行，课之以实用。其他格致、图画、手工皆当视为重要科目，以期发达实科学派。”实学教育其目的是明确的，并非为鼓吹旧的知识、死抱作为旧的朝廷文化支柱的虚无理学不放，正如其文后所言“方今环球各国，实利竞尚，尤以求实业为要政，必人人有可农、可工、可商之才，期下益民生，上裨国计，此尤富强之要图，而教育中最有实益者也。”

日本明治五年颁布的＜学制＞中，阐述了每个人为“立其身、治其产、昌其业以遂其身”则要“修身、开智、长才艺”的基本思想，为此设置学校，以“学问”为“立身之财本”，受教育、长知识以治产、兴业。这种思想经过了明治十年至二十年前后围绕忠君、爱国的道德教育论争，则进而发展为以《教育敕语》为顶端的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由于迫于欧美列强的外压，这种体制的核心依然是以政府国家为主，通过忠君、爱国的伦理，扶植产业，培养产业的后备军。这一视点自然对于晚清朝廷是具有借鉴作用的。在严修的两次东游日记中，以很大的篇幅记录了日本大中小学关于实业教育的设施、课程规范，同时亦注意了普通教育课程中，如何从易、从简引导学生接受知识的问题。如在参观高等师范附属小学普通习字课教授纸笔砚的特色时，严修如下记述道：观寻常第二年室，教员水户君教。师乃取纸两张，先举一纸问诸生，曰此何纸？争举手。乃则一人问之。对曰“普通白纸”，又问彼纸，一人曰“草纸”。又问曰此两种质孰坚？一人对“普通白纸”坚。师以白纸撕碎之，皆成直条。又以“草纸”撕之，皆斜下，极易断，众生皆欢笑，师乃曰此易断者，质不坚之故也……[23]。诸如此类浅近易懂之教学方法等，日记中的记载是颇多的。

在曾为东京博物馆馆长、日本实业教育振兴论的积极倡导者手岛精一的介绍下，严修参观了一些职业学校。例如对共立女子职业学校的课程，他记录道：此校分甲乙两科。职业则裁缝、编物、刺绣、造花、图画，凡五课。甲科生限二课，乙科生选一课。甲乙之外又置补习科与烹饪科。以上为术科。术科之外有学科，其目五：曰修身、曰国语、曰算术、曰家事、曰理科。兼修术科、学

科者为本科生，仅习术科者为选科生[34]。从上述对此双轨制教育体制的文字介绍中，亦可窥见严修对实业教育课程构成的兴趣。

六、结语

《奏折》全文四千余字，结构紧凑，以教育"不在造就少数之人材，而在造就多数之国民"之普通教育论为主线，提纲挈领，又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普通教育贯彻之五个方面分别加以阐述。论点明确，时时佐以日本教育之经验。

晚清教育宗旨的制定，就其本来的性质来说，仍然以张之洞的"中体西用"为主要框架，是慈禧太后溃灭之前的一种应急措施。但自一九〇二年之后大批官绅东游考察之后所制定的教育宗旨，在内容的构成上，较之封建礼教的"三纲五常"，更着重于国民意识形态的形成；较之单纯的存中学、保孔教，更注重于通过宣教而定民心、重公益、务操练、讲实用。显而易见，同＜奏定学堂章程＞一样，受到了日本教育的一定影响（尽管十分肤浅），与日本《教育敕语》体制下的教育在思想方法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辛亥革命之后，民国元年成立教育部，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在公布的新〈教育宗旨令〉中指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35]。对此，在论述与晚清《教育宗旨》的区别上进而解释道："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中略），可以不论。尚武，即军国民主义也。尚实，即实利主义者也。尚公，与吾所谓公民道德，其范围或不免有广狭之异，而要为同意。"唯世界观及美育，则为彼所不道，而鄙人尤所注重[36]。这里，蔡元培所提出的教育思想与晚清教育宗旨，在出发点和总精神上是有出入的，不能同日而语，但是《奏折》提出的"尚公、尚武、尚实"的思想，在某些方面得到继承，亦是不可否认的。

综上所述，《奏折》虽是清末朝廷一派为维护清廷统治，以宣扬复古、忠君、尊孔为主要内容，但就其出发点来说，由于来自欧美日本列强的压力，又于清末康梁等国内维新变法疾呼之中的影响，更于文章拟撰者之个人经历和思想，所以作为清末知识分子在新旧文化以及外强压力下的产生物，《奏折》是有其特点的。在中国如何对待旧有体制的问题上，它从日、德等以帝国、皇统为体制的国家去寻求答案，笔者认为它并非是张之洞等所谓三纲五常的中国精神、西洋器物的"中体西用"的单纯翻版，亦并非是盲目的复古自大，而是知识分子在可能条件下的一种追求。这种追求既可以解释为是对旧体制的维护和对革命的抵抗，但同时又表明了部分官僚士绅在新旧时代变革过程中所作出的努力。

---

①本稿＜奏折＞记述主要引自学部总务司编《学部奏咨辑要》卷一，宣统元年春刊，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十辑影印本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并参照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公布〈学部尚书荣庆为请定教育宗旨天下事奏折〉《历史档案》1988 年 2 期等本。标点为笔者所加。

②关于晚清时荣庆在政界的活动及其态度，本稿参阅了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 436 列传 226 荣庆传，中华书局出版 1977 年 8 月、谢兴尧点校《荣庆日记》，西北大学 1986 年、〈立宪纪闻〉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四》，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记述。特别是参考了戴逸、孔祥吉论文《荣庆其人与〈荣庆日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通讯》1987 年第 3 期。

③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下》，中华书局 1987 年 5 月，第 1250 页。郭廷以著《近代中国史纲》上册（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0 年第 2 次印刷）第 367 页中亦有相类似论旨。另参见严修自订高凌雯补严仁曾增编王

承礼辑注张平宇参校《严修年谱》,齐鲁书社 1990 年 1 月第 180 页、齐植璐〈天津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 25 辑,1983 年 9 月,第 18 页等。

④关于严修兴办学堂的情况,参见同上齐植璐<天津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论文。刘炎臣、汪桂年<天津近代教育发展概略>同上《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 27 辑 1984 年 4 月等。

⑤参见(日)阿部洋《中国の近代教育と明治日本》福村出版 1990 年 8 月等。

⑥⑪关于严修一九 0 二、一九 0 四年赴日考察教育的情况,本文参照了天津图书馆藏《严范孙先生日记不分卷》同年日记内容。

⑦参见天津图书馆藏《严范孙先生日记不分卷》1904 年初日记。另见张绍祖编著《津门校史百汇》(陈灿文主编《天津地名丛刊》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5 月)中相关记述。

⑧引自<张志鹤川沙县公立小学校沿革纪要>方鸿铠等修黄炎培纂《川沙县志》民国 26 年卷 9 教育志。

⑨参见张之洞著《劝学篇》。

⑩参见《严修年谱》第 222 页。

⑫引自天津图书馆藏《严范孙先生信草不分卷》。

⑬<恭读三月初一日上谕谨注>丙午二月初三日中外日报。转引于《东方杂志》第三年第五期 1906 年 6 月。

⑭(日)文部省《学制八十年史》昭和 29 年 3 月,第 715～716 页。

⑮参见(日)仲新《日本近代教育史》讲谈社昭和 48 年 4 月。

⑯⑳㉑㉓㉔引自天津图书馆藏《严范孙先生日记不分卷》1902 年、1904 年日记。

⑰引自天津图书馆藏《严范孙先生信草不分卷》。

⑱引自梁任公著《饮冰室文集・三》天行出版社刊行 1958 年 5 月四版。

⑲参见西村茂树<尊王爱国论>日本弘道会编《泊翁丛书》第 2 辑明治 45 年刊第 653 页。见仲新《日本近代教育史》第 112 页。

㉒参见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上海中华书局印行民国二一年十一月再版第 118 页。

㉕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 年 10 月第 223 页。

㉖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 1984 年第 136 页。